

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谢武军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前 言

吾死之后，置吾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

毛泽东：1918年《伦理学原理批注》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毛泽东：1965年与斯诺的谈话

1900年，古老的中国拖着被鸦片、饥饿、疾病和战乱折磨得瘦骨嶙峋的身体进入了20世纪。四万万“东亚病夫”——长辫子的男人和小脚的女人，被世人所耻笑和欺侮。“世界各国的军队 / 开进来又开出去 / 地上溅满了鲜血 / 他们抢劫你，就像你是一座没有主人的房屋”（聂鲁达：《新中国之歌》）毛泽东决心改变这一切，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把黑暗的老中国变成光明的新中国，把古代的中国变成现代的中国。他把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具体化为两大任务：“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这两大任务实际上也就是20世纪中华民族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毛泽东一辈子就在做这两件事。他像一位

纤夫，拉着中国这艘既大且老的船，一个一个目标地往前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失误，但在这两件大事上，毛泽东始终是执着的。在毛泽东的带领下，20世纪成为中国人在沉沦中奋起求存求强求富的世纪，成为把中国全面地从古代向现代推进的世纪。也正是在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成为现代中国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旗帜、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旗帜。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比美国的林肯、印度的甘地、巴基斯坦的真纳逊色。与他的伟大功绩相比，他的失误不能不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不仅以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实践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史，而且以他的思想和个性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是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他对我们这个民族思想的影响决不会亚于孔夫子。可以说，他是为现代中国塑造灵魂的人。毛泽东对中国人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大概也就在这里。

毛泽东的一生与文学有着某种不解之缘。毛泽东不仅以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左右了20世纪中期的中国文学，而且以其豪放典雅的诗篇和雄辩清彻的散文丰富和提高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他的才华横溢的诗文，作为他的博大胸怀、伟大人格、浪漫气质和求实精神的自然流露而令人倾倒。尤其不可忘却的是，毛泽东是第一个真正关心人民教育、大众文艺的人民领袖，他切切实实地领导了将新文学普及于平民的伟大实践。他的努力为中国文学在下一个世纪的新的繁荣准备了更肥沃的土壤，打下了更深广的基础。而他所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左”过一次的文艺批判，又严重地束缚了艺术生产力，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一处败笔。

本书的写作过程也就是阅读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理解毛泽东的过程。在我比较充分地占有了材料之后，上述对毛泽东的认

识与理解自然而然地产生并越来越强烈，也就越发感到有必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以表达自己对毛泽东以及他生于斯长于斯并给予伟大影响的这个时代的一孔之见；也就越发感到这些年来文学圈中的某些流行观点之浮浅与有害。对毛泽东这样的世纪伟人，任何情绪化的评说都是不可取的。而最令人不敢恭维的是那些善于在政治上翻筋斗的“俊杰”。他们以“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为能事，先把毛泽东“批倒批臭”然后又否定孙中山及旧民主主义革命。他们以为，中国如果没有这样那样的革命，中国如果成为殖民地，早就现代化了。他们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似乎20世纪的中国文化（文学包括在内）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他们自己也好像从来就没有穿过中山装（或称毛式服装），而是直接从长袍马褂换成了西服革履，21世纪的中国文化正等待着他们直接从孔孟之道和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去酿制。政治上的偏见往往使人忘却常识。21世纪的中国只能从20世纪的终点开始，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只能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那些想把20世纪的中国一笔勾销的人，历史会证明他们是可笑的。

由于天生反感形式主义，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我没有绣过“红太阳”，没有跳过“忠字舞”，也没有当过“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对毛泽东不崇拜。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我目睹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祖国如何从一穷二白中艰难地发展，对毛泽东的伟大实践和深刻思想也耳濡目染，受益殊深。这些是很难随着毛泽东已经逝去、已经不再至高无上而灰飞烟灭的。我毫不隐讳地承认，我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有许多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同时，少年时代经历的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还有物质的匮乏与思想的禁锢，也是难于忘却的。正是这一切，使我们这一代人对毛泽东似乎有着更多的理解。也正是这一切，把我们这一代人与毛泽东

和他的时代紧紧地拧在一起，使我们很难超越领袖人物的成败得失去梦想自身价值的实现；使我们很难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荣辱兴衰分开。因此当我把毛泽东和他那个时代的种种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贡献与局限进行分析批判的时候，似乎并不单纯是对对象的肯定或否定，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

在这个利益多元的时代，思想的多元是必然的。当我们提起笔来，想对某一件事情说三道四的时候，已经需要考虑选择立场的问题。写这本书，我只能遵从自己内心的驱使，力求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探讨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我想，正确地分析前人的得失，充分肯定前人的贡献，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创造力，反之，那是我们走向成熟与文明的标志。

在毛泽东逝世2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作为纪念。

作 者

1996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毛泽东与传统文学 (1)

 一、文学的启蒙 (2)

 二、更上层楼 (7)

 三、情钟屈原与熟读韩愈 (13)

 四、“文学为百学之原” (23)

 五、学生时代的诗文写作 (27)

 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40)

第二章 毛泽东与外国文学 (47)

 一、了解世界的渴望 (48)

 二、对西方文学名著的涉猎 (51)

 三、“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 (58)

 四、多渠道地了解外国文学 (65)

 五、关于《简·爱》、《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红与黑》 (71)

 六、“洋为中用”与“中国化” (75)

第三章 毛泽东与文学革命 (83)

 一、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85)

 二、追随《新青年》 (91)

 三、“五四”新潮与平民主义 (98)

 四、“国民性”评析 (102)

五、“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	(106)
六、“文学革命”观	(116)
七、毛泽东与李大钊、胡适、陈独秀	(124)
第四章 毛泽东与民族文化的保卫、发展	(13 7)
一、“我首先仍然是中国人”	(138)
二、20世纪中国的摩西	(142)
三、“嚶其鸣矣，求其友声”	(155)
四、毛泽东《祭黄陵文》	(163)
五、抗战救国论与“毛文体”	(166)
六、进步文化人奔向延安	(172)
七、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177)
第五章 毛泽东与现代文论	(183)
一、说不尽的《讲话》	(184)
二、《讲话》动因管窥	(187)
三、论艺术生产	(195)
四、论艺术接受	(205)
五、论普及与提高——艺术发展规律之一	(209)
六、论专门家与群众的创作——艺术发展规律之二	(215)
七、论文艺的作用	(227)
第六章 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	(235)
一、会师北平	(235)
二、正确的决策	(239)
三、新中国文艺的初步繁荣	(249)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265)
五、形形色色的文艺批判	(288)
六、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308)
后 记	(318)

第一章 毛泽东与传统文学

站在20世纪的终点反观中国文学，我们发现，尽管本世纪的文学确有与它以前历朝历代文学的若干不同点，尽管本世纪的中国人把文学改造社会、移风易俗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然而，传统的血脉和基因还是透过汉语和方块字绵延其间。在中国文学这部宏大的交响乐中，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是其中一段小小的乐章。传统是一座千年不化的雪山，而20世纪的文学只是雪山下的一条小河。要探讨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不能不涉及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统文学始终是毛泽东呼吸空气的一部分，是他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风华文章点染着他青少年时代的峥嵘岁月；诗词歌赋为他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平添几分风流；而最后，那永远读不完、读不厌的中国古典文学则是他寂寞悲怆的晚年生活的慰藉。毛泽东不是一个职业的国学家或诗人，但却远比一般国学家和诗人对传统文化了解得更多。他的知识构成和思维方式中不存在文化断层，他像一棵大树，根深叶茂，任何狂风暴雨都难于将他吹倒，他从中国历史深处走来，在20世纪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辉煌的英雄剧，而五千年的文明史，则是他纵横驰骋的舞台背景。他的思想是五千年文化发展到20世纪必然开出的一朵文明之花，其民族色彩、历史色彩和时代色彩都是极为鲜明的。

一、文学的启蒙

从文学修养的角度看，毛泽东童年生活的环境无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比。他出生在落后的中国内陆省份一个封闭山村的农民家庭里。虽然他的家庭逐渐积累了一点财富，从赤贫变成中农，后来又变成富农，但始终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的经济地位，没有摆脱半文盲的文化地位。他父亲粗通文字，会算账，母亲是文盲，村里的人也都孤陋寡闻。因此，毛泽东直接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的只有一个堂堂男儿之躯、一个讲求实际的头脑、一副善良宽厚的心肠以及勤劳俭朴的习惯。他后来所具有的高度文学修养和造诣，全靠他自己勤奋学习而获得。

所幸的是，毛泽东的童年主要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他深得外祖母的喜爱。八舅在家开馆授徒，小小的毛泽东经常去旁听，受益殊深。和姨表兄弟姐妹们一起做游戏、听故事、念儿歌，不仅丰富了他的童年生活，也给了他最初的文化熏陶。因此，当他刚满8岁那年，跟母亲到外婆家去拜年，正碰上耍狮子，欢乐的艺术氛围，感染了少年毛泽东，他脱口而出，赞了四句：“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第81页）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开始在本村的私塾上学，后来又先后在关公桥、桥头湾、井里湾、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就读。他的启蒙老师是邹春培，在邹老师那里，他开始了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学习生活。从《三字经》开始，然后是《论语》、《孟子》、《诗经》。他学会了用《康熙字典》，加上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不论老师点过的，还是未点过的课，他都能背得出来，还学会了对对子。在塾师毛润生、周少希那里，毛泽东已能默写“四书”、“五经”

中的许多内容，且颇有领悟，并开始认真学习书法。塾师毛宇居指导毛泽东阅读了《公羊春秋》、《左传》等，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写诗作文。毛泽东当年的同学回忆说：“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作，他作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作。”（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第11页）

有一次毛宇居先生外出，让学生在屋里背书，毛泽东却爬到山上，边背书边摘毛栗子，回来分给同学们并孝敬老师一份，老师不但不领情反而对他大加训斥。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倒毛泽东，便心生一计，来到院中，指着天井说：“我要你赞井！”毛泽东围着天井转了两圈吟道：“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同学们拍手叫好，毛宇居十分尴尬，并意识到自己教学的弊端。这大概是毛泽东所留下的最早一首诗。这年他12岁。这首诗虽然还带点儿歌的味道，但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少年毛泽东不仅才思敏捷，而且很善于独立思考，以在井里的小鱼比喻关在屋子里死记硬背的学生，表达了他对旧教育方式的批判。

这时候，毛泽东开始接触并大量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他自己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8页）塾师毛宇居的回忆与此相印证：“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

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能背得出来。”（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第11页）尽管如此，对古典小说的迷恋终于给他带来了不幸。1906年阴历10月，因为他背着老师偷偷读《水浒传》被老师夺走了书，还说：“你这是反叛，我不敢教你了，收拾你的书箱回去！”于是，他被赶出了私塾，第一次失了学，当时他13岁。

发蒙晚而又中途失学对天生读书之才的毛泽东当然是巨大的损失，在他成年之后，还这样沉痛地写道：“自恻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4页）

从13岁到16岁，毛泽东在家里又当了将近三年农民，但他总是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他把韶山冲能借来的书都借来看了，连和尚的经书都读了，又到外婆家向舅舅、表兄等亲戚朋友借书。1909年，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李漱清因失业回到韶山，毛泽东经常向他请教，听他讲述维新救国之道和爱国志士的动人事迹。李漱清向他传播新思想，推荐新书目，并认真帮助他修改作文，使他的眼界和能力都进了一大步。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最早的成形的文艺观，他继续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但不再把它们仅仅当成有趣味的故事来阅读，而是开始分析它们的内容，进行思考并有所发现。他回忆道：“我继续读中国的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种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中国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当时，他曾带着这个问题，询问了许多人，同学、老师、长辈，大家都回答不出来，觉得这是个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怪问题。“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

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9页）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最早的成形的文艺观，他思考的是劳动人民在文艺中的地位问题。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人民在文艺中的无地位，对这种现象表现出极端怀疑、愤懑不平 and 批判的态度，并下决心做人民的代言人。当时他曾对小伙伴们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要写农民的书，要写劳苦人的书。

少年毛泽东在自己有限的生活范围内，早就感觉到社会的不公平，感觉到富人对穷人的压迫，父亲对子女的压迫，因而萌生一种自发的反抗心理。对英雄传奇小说的迷恋也是这种内心趋向的表现。豪侠之士们惩治贪官污吏、杀富济贫的英雄行为表达了毛泽东内心朦胧的向往，使他产生出了一口恶气的快感。但好学深思的天性很快就使他对这些小说的社会内容和思想倾向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些小说所歌颂的并不是真正的种田人、下等人。农民们终年辛苦才使人们不致饿死，然而在这些小说中却没有农民的位置，这未免太不公平了！于是当初那种心理上的满足，就被对整个社会更深的怀疑所代替，并努力去探究造成这种文学上的不公平的社会原因。农民在文学上的无地位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无地位，他们在社会上无地位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只有为那些拥有并控制着土地的统治者种田。但少年毛泽东还没有想到要从解决社会问题入手来解决这个文学问题，只是想到自己将来去做个写书的人，去为农民写书。从毛泽东的这段思考，我们既可以看到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也可以看到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即具有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史观和文艺观。这是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一旦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他就更明确地认识到，农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主体，他们创造了支撑整个封建社会一切文化活动的物质基础，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本上却是属于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的，这是一个大颠倒。“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

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9页）“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说唐》、《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30页）20年代的这些论述与他少年时代的思索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1909年8月，毛泽东第二次入学，先后就读于塾师毛岱钟、毛麓钟处。毛岱钟毕业于政法学堂，当过律师，以讼笔闻名于韶山一带。毛麓钟是韶山唯一的秀才，曾在蔡锷部下任职，见多识广。毛泽东在这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又读了不少书，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王世贞根据朱熹的《通鉴纲目》编写的《纲鉴类纂》、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这些书不仅丰富了毛泽东的历史知识，而且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古文字功底和文学修养，著者的道德文章以及爱国情操也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可惜，1910年6月，毛泽东的父亲又强迫他退学。原因是毛泽东支持韶山农民闹了毛氏祠堂，把祠堂的积谷按平价卖给了农民。这显然是毛泽东对古典小说中那些英雄豪杰的侠义行为的摹仿。族长向毛泽东的父亲告状，父亲一气之下，就不让他读书了。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前后六年的私塾学习生活。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谈哲学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尽管毛泽东自己对这一段学习生活评价不高，但事实上这种强迫灌输，使他受到了传统正统文化的熏陶。儒家经典的主要内容成为他的智能构成的重要部分。现在看来，这大概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处于两个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幸运。创造了中国的现代政治、现代军事、现代文学和现代科技的一代宗师，都具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在他们的少年时代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

较系统的了解，然后又接触了西方近现代文化，于是有所创造。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六年的私塾生活，给毛泽东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字功底和古典文学功底。在老师的教授下，他初步接触到诸子散文、传记文学、诗词歌赋，不管理解与否，皆能倒背如流。通过自己的阅读，他对带有浓厚民间意识和民族色彩的传奇小说也了如指掌。在封建正统文人看来，前者是文学正宗、国粹，后者是稗官野史、淫书邪说，应该禁绝。而新文学代表人物则视前者为“谬种”、“妖孽”，视施耐庵、曹雪芹为“盖代文豪”。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反映了世界观、价值观的区别。前者的迂腐保守自不待说，而后者也多少带点矫枉过正的偏颇。事实上，正是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学的主要内容。诗词歌赋是中世纪中国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而古典小说则是与西方文艺复兴同时代的中国文学上的骄傲。如果毛泽东只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就只能接受封建统治阶级钦定的文学部分；如果毛泽东只是个盲目的自学者，他的文学启蒙也会是不全面的。毛泽东少年时代的独特经历和个性，恰恰使他避免了这样的局限。孔孟之道与稗官野史、诗词歌赋与古典小说、正统与非正统、官方与民间，从不同渠道，通过不同的形式，源源输入他的头脑，融化在他的血液中，而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与他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传统文学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二、更上层楼

第二次停学一个多月之后，在母亲、亲友和老师的劝说下，父亲打消了让毛泽东去米店学徒的打算，同意他去报考新式学堂——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留赠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里有对

父亲的感激，一心想发家致富的父亲同意继续供他读书，可算是相当开明之举。毛泽东将他的感激之情化为要发愤读书、有所作为的决心。

当毛泽东自己挑着行李到了东山学堂时，看门者却将他拒之门外。正在吵闹不休，堂长李元甫先生出来问明原委，说：“我们的考期已过。不过，你确有真才实学，也可考虑录取。”随即出了一题《言志》，要毛泽东作文。毛泽东立即动手，一顿饭工夫就交了卷。李元甫阅后，高兴得把学堂的管事先生都请来了，给他们高声朗诵毛泽东的文章，并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萧三：《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24页）先生们也赞不绝口，竟破格录取了他。靠自己出色的写作才能，毛泽东第三次上了学。这一次进的是新式小学堂，毛泽东当时不到17岁。

东山学堂是毛泽东走出封闭山村的第一站。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外国文学、音乐、历史和地理，接触到了自然科学，给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在这里，毛泽东得以系统阅读《新民丛报》等维新派的书刊，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使他爱不释手，许多章节都能背诵下来，这不但影响了他的文体和文风，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由崇拜孔夫子转而“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13页）在这里，他又读了许多关于尧舜、秦皇、汉武的书，他学得最出色的是国文和史地。他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国文老师谭咏春十分欣赏，写下了“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评语，并批给全班同学传看。这些文章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毛泽东却印象很深。1955年谭咏春的儿子来北京时，毛泽东在谈到这些文章时说：“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个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同，只有他同意我的。”（曹志为：《伟人之初：毛泽东》，第24页）

毛泽东宏大的眼光、逼人的气势、独立不羁的个性，从他17岁时所写的一首诗中亦可窥其一斑。老师出题《咏蛙》，让学生写诗，同学们的诗大多写蛙鸣如开音乐会，青蛙是益虫，可以吞食害虫之类。而毛泽东却写道：“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张湘蕃：《毛泽东咏蛙诗》，《中国青年报》1988年4月10日）这首诗正是毛泽东那句话“那个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同”的注解。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进一步感觉到中国社会的等级差别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未进校门，他与门房发生争执时，富人子弟就差一点和他打起来。入学后，因为他穿得比别的学生寒酸，又不是湘乡人，不愿介入湘乡人的派系斗殴，结果上中下三派都看不起他，使他感到精神上很压抑。（地域观念，阶级差别和歧视，使人们不能平等和睦相处，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消除这些差别和歧视。）这种精神压抑从反面刺激着自尊自强、独树一帜的心理，这种心理不仅表现在行为上，也表现在文章诗词中。“诗言志”，赋予小小青蛙以虎气，不仅角度新、立意独特，也表现了毛泽东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相映成趣的是，1917年7月，毛泽东和萧子升游学到安化县，曾拜访劝学所长夏默庵。夏默庵学识渊博，能诗善文，性情高傲。毛泽东两次求见，均遭拒绝。第三次登门，夏才开门相见，并挥毫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测试来人学问的深浅。毛泽东当即以“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相续。夏连声叫好，留他食宿，昼夜长谈，临行还赠送银洋八元。（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第42页）也许毛泽东一读到“绿杨枝上”，就想到了自己当年咏蛙的“绿杨树下”，自然以“蛙句句”对“鸟声声”，出手既快，又贴切，且暗含批评意味，使夏默庵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不仅以一手好古文全校闻名，而且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

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13—14页）

半年之后，1911年春，堂长李元甫先生认为毛泽东的学业已提前达到了中学程度，不宜再留在小学，便推荐他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就读。恰好学校的贺岚岗老师应聘去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他帮助毛泽东顺利入学。从此，毛泽东走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毛泽东走进省会长沙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在这里，他从阅读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开始，养成了阅读报纸的习惯。从现代中国的各种主要报刊上，毛泽东学到了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及时了解到国际国内的大事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包括文学思潮）。在辛亥革命中，毛泽东带头剪掉了辫子，而且在湖南新军里当了半年兵。后来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当时，校长符定一和老师们怀疑入学考试的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要他当场再写一篇。结果证明，毛泽东确实是写文章的高手。从此符定一与毛泽东保持了几十年的师生情谊。

毛泽东深厚的国文修养，博得了许多国文老师的喜欢。有一位国文教员主动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自学能力和兴趣。他的国文教员柳潜是一位前清秀才，对他特别赏识，常常称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保存至今的毛泽东最早的一篇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即是他1912年6月在高等中学时所写。文章一起笔便是三叹息：“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法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文中毛泽东称赞“商鞅之法良法也”，商鞅是“首屈一指”之“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表达了他自己渴